

文史资料选编

第四卷

政治军事编

第五册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编

第四卷

政治军事编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第五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资料选编. 第4卷, 政治军事编. 第5册/福建省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3

ISBN 7-211-05280-5

I. 文… II. 福… III. ①文史资料—福建省②政治
事件—福建省—民国③军事史—福建省——民国
IV. 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6236 号

政 治 军 事 编

ZHENGZHI JUNSHI BIAN

《文史资料选编》第四卷(第五册)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福州市计委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斗西路 21 号 邮编:350005)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2.125 印张 4 插页 3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7-211-05280-5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耀华

委员：王耀华 林爱枝 方 群 刘 珂

陈逸清 林大坚 林金水 侯伟生

俞金树 施学慨 郑成钟 黄小宁

执行编辑：郑成钟 卢 平

校 录：郑广红



目 录

我参加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大会的经过	葛越溪(1)
抗战后期德化地下党的活动情况	叶养民(5)
我与民主建国会福州分会	郑思缄(12)
我与民联(民革)的关系和工作情况	张圣才(16)
黄埔军校同学组织演变过程及其在福建活动 的片断回忆	杨 立(42)
弹炸福建第一任民政长张元奇	刘 通(52)
北京五四运动的点滴回忆	卢月波(55)
闽水怒潮——五四运动在福建	孟 茂(58)
从五四运动到六五运动的回忆	傅 晖(63)
围捕张国华的前前后后	张愧愚(70)
刺杀谢翔高详情	孟 茂(75)
暗杀陈鸣岐经过	讲述林大绥 整理孟茂 陈忍仁(77)
五卅运动在福建	杨湘衍(79)
五卅运动中的连江建和惨案	林今生(85)
长汀沪案后援会始末记	郑迪群(88)
参加福州青年运动的实况	陈国振(90)

福建省参议会透视	刘 通(94)
福建省参议会一次例外听取福建省渔会的报告	陈鸿铨(97)
闽侯县参议会活动回忆	林超然(99)
福安县临时参议会的活动概况	黄秉炘(122)
长汀国大代表选举受灾记	吴德贤(133)
长汀国大代表选举丑剧	黄慕贤 郑迪群(146)
长汀县参议会竞选议长内幕	黄慕贤(154)
帮助刘通竞选主委	林大绶(159)
“倒林拥萨”政潮忆述	杨湘衍(161)
林森主闽经过和“倒林拥萨”的前因后果	刘 通(171)
林森、萨镇冰保住了省长保不住政务厅长	潘守正(194)
徐学禹在福建	谢友仁(197)
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	王克勤(205)
福建省计政概况	王克勤(210)
福建统计简介	薛国栋(224)
福建省训练团见闻散记	廖宗刚(228)
从事田粮人事工作的回忆	郑寿岩(236)
解放前夕的福建省第六专区	高 垲(248)
福建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暨第五区 保安司令部组织概况	汤 涛(260)
我任长汀行政督察专员的回忆	林思贤(264)
福建县政拾遗	周 汾(273)

四主县篆琐忆	钟日兴(277)
金门县政回忆	叶忠熙(289)
我在长乐的一些回忆	管长壖(292)
我在长乐十个月	欧阳烈(301)
我在永泰的回忆	赖 健(309)
抗战时期我在南安、罗源、连江的片断回忆	谢 真(318)
军阀民军割据时期永、德、大三县的县长	许礼贵(337)
福建省地方行政人员甲种养成所	李仕铨(345)
福州二度沦陷期间的“物资调节处”	蔡友兰(347)
福州联甲组织	林厚祺(350)
关于“福州联甲组织”的补充说明	林厚祺(354)
保甲制度在福州	陈鸿铨(355)
福州的保甲组织	林厚祺(361)
辛亥革命后福建律师的概况	叶承谦(366)
我的一些经历	林厚祺(370)
国民党文官考试制度的梗概与见闻	叶树霖(377)

我参加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大会的经过

葛越溪

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在福建省尚未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在全省各县党的组织也仅是小组。建瓯县原也有党的组织，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肖劲光同志任党代表）进驻建瓯后，建瓯的党组织始命名为“CP”。开始，建瓯只有党员葛越溪、潘作民二人，而后吸收了杨峻德、翁树年、黄育三、方文治、张绍强等人，李康在外地入党，后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当时，建瓯的工农群众组织都在党的领导下，对外是以国民党建瓯县党部的名义活动，但实际上是为中共工作。

1927年3月，福州的林寿昌等国民党右派发起“清党”运动，驱除马式才、李培同等国民党左派。“马·李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建瓯县党部强烈反对，并写信给国民党中央控告林寿昌等人的做法（那时，尚不知蒋介石已在准备政变）。这件事引起国民党中央的注意，国民党福建省委也因此知道了建瓯有共产党组织，且国民党建瓯县党部已被共产党所控制。所以，国民党在福州进行反动“清党”后不久，将葛越溪、潘作民开除了县党部。

1927年5月，我（时任中共闽北临委福州办事处书记）先到福州寻找党组织，拟向福州党组织汇报建瓯情况。但到福州后，始知福州的党组织已遭严重破坏，原中共福州地委宣传部长方尔灏（因他在清党前是公开以党的身份活动，并印有名片）首先被杀害，组织部长陈兴钟等人亦被捕入狱，党组织的其他同志有的被捕有的失踪，以致无法联系上。当时，我以为党的中央领导人尚在上

海,于是决定乘船秘密前往上海,向中央领导人汇报情况。但到了上海后方知,由于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上海已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我到上海后,住在一个亭子间里,但找不到中央的领导人。有一天傍晚,一个外省的人找到我,他问我:“你是否从福州来,认识不认识梅电龙”等,查对了我的名字后,他对我说:“你現在在上海已找不到人,中央已迁到武汉,”又交给我300元钱,说:“中央要我把这钱交给你,你不要回建瓯,要马上回福州将没有被捕的和失去联系的同志尽快组织起来,重建福州地下党组织。”并要求将党组织的情况向武汉汇报。

1927年夏,我秘密返回福州,住在陈兴再家中,后联系上苏建维、陈炳及王震云的侄子,共有十余人。我与苏建维在福州南门外一个乡村组织了一个小组。当时,这些人员的名单均由陈兴再保管,但由于陈的大意,名单被丢失在人力车上。陈因为名单丢失不敢来见我,我听陈炳说后,感到事态严重,但为了不影响人心,造成混乱,只得秘密给陈开除的处分,并将此事告诉了尚在狱中的陈兴钟。陈兴再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同意我的做法,并要我仍住在他家。以后,我写信到建瓯,叫杨峻德速来福州协助我工作。杨来后认为住在这里不安全。我们又搬到福州北门一间民房居住。那时,我们在福州开展工作还算顺利,其间吸收了一批新党员(大约20人左右)。

1927年秋,潘作民、陈昭礼由建瓯来榕通知我说,中央决定闽南、闽北两临委联合成立福建临时省委,并告知我即去漳州参加全省各县党的负责同志联席会议。于是,我将福州的工作暂时交给杨峻德主持,深夜与陈昭礼夫妇和潘作民等,从马尾搭乘上海到厦门的班船。由于我们4个人身上带的钱不够,只好坐统舱。同时,为了防止路上检查,事先约好都不带秘密文件。早上开船,第二天下午到达厦门。陈少微在厦门码头接我们,并带我们到鼓浪屿租了一间民房。由于没有带铺盖,我们4人都睡在地板上。当晚,陈

少微(他是从上海直接乘船到厦门)与陈昭礼谈了路上的情形。他说,组织上原交给他900多元作为活动经费,但在路上遇到土匪抢劫,这笔经费丢了。陈昭礼听后,就悄悄叫我出来,讲了这情况,我听了十分着急。因为那时党的活动经费已经十分紧张,这笔钱丢失,势必给今后活动造成很大困难。陈少微当晚就走了,他介绍了一个朋友来接待我们。晚上,我们吃了白稀饭,但觉得非常咸,感到奇怪,那位接待人说,现在不便向邻居借淡水,这饭是用海水煮的。过了两天,我们即乘车去漳州。由于我们带的钱所剩无几,车票也是这位接待的人去买的。

到了漳州,我们住在一间民房。第二天,罗明同志即派人与我们联系(由陈少微通知罗明同志)。这位联络员说:“明天就要召开大会,为了安全,开会地点现在还需保密,第二天会有人带你们去。”

第二天上午,有一个人来带路,具体地点他也没说,只叫我们跟他走。我们到了一间民房,房里有十几二十人左右。我见到了罗明、陈少微等人。会场没有椅子,大家都席地而坐。会上,首先是罗明讲话,他宣布联席会议开始。他说,除了闽西的陈祖康因工作关系不能来开会外,所通知的各地代表都来了。

罗明先谈了当前全省各地的斗争形势。他说,在国民党反动派清党后,中共中央清除了机会主义,实行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至于经济方面,过去我们有苏联的援助,而现在只能靠各地自己设法解决,中央无力资助。

罗明同志发言后,各地代表汇报情况。闽北地区由陈昭礼汇报,他汇报了建瓯党组织情况,如吸收发展了多少人等等;福州方面由我汇报,谈了福州第一个受到清党打击,组织遭严重破坏的情况,重建组织经过以及发展了十多个新党员,并汇报说,在没有得到中央指示前,福州试图策划暴动,曾派王震云的侄子带一批人到南门外打土豪劣绅,想把这一事件作为暴动引火线,但由于土劣们

都避开了，结果打不起来。

会议开了3天。会上传达了中央要求各地无条件地执行中央关于立即组织暴动的指示，提出了暴动口号：“杀那杀人的，抢那抢人的，以暴易暴”。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罗明、陈少微（即陈明）、陈祖康、陈昭礼、葛越溪、林熙盛、王海萍、蔡珊、李联星等9人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选出罗明、陈明、陈昭礼、王海萍、林熙盛5人为常委，陈明为临时省委书记，陈昭礼为组织部长，王海萍为宣传部长。决定我以省委委员兼闽北巡视员身份秘密回建瓯，组织暴动工作。

会后，陈少微（陈明）交给我几十元钱作为我和潘作民的旅费。我先回福州找杨峻德，向他传达了这次大会的会议精神以及派我回建瓯的决定，并把福州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全盘移交给杨峻德同志。1927年12月，我秘密动身回建瓯。

（1984年10月）

抗战后期德化地下党的活动情况

叶养民

1937 年底我由日本东京回国,1938 年任省警官训练所政治教官,1940 年任驻闽绥靖公署情报处总务科长,1941 年任永春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秘书,1943 年调任德化县长,1946 年调任长乐县长。十多年来我都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现将我任德化县长时所做、所闻、所见的事情概述如下:

—

1941 年,我在南平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部做挂名参议(即拿钱不做事的闲散人员)。同年春,张德钟以“委员长侍从室”视察的身份,拿着中统特务头子陈果夫的亲笔介绍信,到福建找闽省主席与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张德钟在 1925 年春,曾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委员会,担任委员。那时,省党部筹备主任委员是丁超五,马式材、李桐培等同是委员,我也在省党部做过短时间的干事,与马式材、张德钟、李培桐均相识。不久,福州反共头子谭曙卿、林寿昌等掀起了驱逐“四凶”的反共暴行,把马式材、李培桐、张德钟等赶走。这次张的来闽,可谓“东山再起”,可是他这次是以 CC 系特务身份回来的。

刘见到国民党中央大人物的介绍信,不得不敷衍一番,当即委任张为福建第四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接受任命后,即到南

平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部找总参议马式材(子谷),商议接收四区专署事宜。马介绍我担任该专署秘书,帮同前往永春接收。可以说我与张德钟虽旧相识,但毫无政治渊源,只是因为马式材的介绍,才充作“张专员的幕府”人物,我“忠心耿耿”地替他办理接收,替他批阅文件,他出巡期间,我又代行他的职务。1943年秋,经张德钟向省府主席刘建绪推荐,我被委任为该专区所辖德化县县长。

二

德化地处闽中,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土匪甚多。抗战期间,海口被日军封锁,沿海公路又悉数破坏,德化、大田就成为闽南、闽北唯一的交通要道。当时的闽省政治军事中心由福州转移到永安,德化更是闽南到永安的主要路线,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同时,德化居民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是共产党组织武装力量的主要对象。所以在德化、永春边境,德化、大田、永泰等县边区以及德化腹部的戴云山区等地,都听到有地下党武装部队活动的消息。作为闽中革命根据地之一,德化境内的葛岭镇(毗连尤溪)、赤水乡、双洋乡(毗连永春)、水口乡(毗连永泰)以及边区的浔中镇、锦阳乡(毗连永春)等都有共产党秘密据点(交通站),吸收很多革命知识青年及贫下中农为交通员,但整个部队行动与国民党军队公开对抗的事还少。我在德化两年多的时间内,只发生过一次。1944年冬,德化、永春边境某乡公所被共产党游击队(约三四十人)袭击,打死乡丁数人,夺去乡公所枪枝数杆,没收该街泉大布店的布匹。那里原驻有县自卫队一班,听到枪声,惊惶万分,伏在碉堡内,不敢出击,听任游击队向永春边境扬长而去。

三

1943年冬,我接到省保安司令部密令:将浔中小学教员共产党嫌疑分子黄祥风押送梅列省保安司令部审办。黄祥风,女,福州人,她的哥哥是德化县政府军事科中尉科员,她住在县衙后边的县府职员宿舍内,经常到县府游玩,因为是同事的家属,又是福州同乡,故比较熟悉。我平时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殊活动,也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密报,突然接到上级电令,很吃惊,只得叫她来警察局谈话。那晚,我亲自前往审问,她极口否认有参加地下党活动,我当时也不能提出有力证据来证明黄祥风是共产党员。我想上级既有密令,多少总有根据,当晚即令她睡在局长室,派人看管。第二天,我即令警察局派警将其押解到梅列,后听她的哥哥说,关在梅列集中营受训。

1944年某月,我又接到省保安司令部密令:该县双洋乡某保国民学校有一教员某系共产党交通员,利用教员身份进行地下活动,要求我将其缉捕送省审讯。我经派警局侦警会同该乡乡长前往学校查捕,据回报,该校教员某业已离校数月,无从缉获。我据实将情形向省保安司令部呈报。

1945年秋,驻永泰的省保安团队在永德边境“剿除”地下党武装部队根据地,将深山中所搭的临时棚楼摧毁,并捕去无辜农民。该保安团还越县境跟踪追至德化的毛厝保(毛厝保属水口乡,和永泰县交界),并逮捕数人。省保安团事前没有和德化县政府联系,事件发生后,我得到水口乡长黄其岗电话报告,翌日,带同随从数人前往水口乡公所查询事实真相,并召集该乡全体保长及保代表来乡公所开会,着重调查毛厝保地下党活动及保安团逮捕该保保民情形,各保长均讳莫如深,不敢据实报告。后经开会决定:设立各保“匪情情报网”,由乡保长指定专人负责通讯,并与邻乡邻

保互相通报,互相策应,有“匪警”时,立即电报县府核办;普遍实行“五家连保连坐切结”,制订“通匪”、“窝匪”处分办法,奖励检举密告等等措施。原指望这样可以防止地下党的活动,但事实证明适得其反,听说没有几个月,毛厝保自保长以下均参加了地下组织,革命力量迅速增长,但我那时已经离任了。

1946年1月,据浔中小学校长密告:该校教员李友梅(本县人)是个地下党员,有秘密活动的各种迹象。我即令警察局侦缉组人员将李带到县政府,亲自审问,虽经利诱威胁,劝其据实供认,但李始终否认此事。

1946年2月,我与原长乐县长宋庆烈(宋庆烈是复兴社福建省主要骨干之一,也是军统特务的小喽罗之一,和特务头子王调勋、林铮等关系密切)对调职务,调任长乐县长。那时,德(化)大(田)边境及德(化)永(泰)边境地下党活动甚为活跃。宋到任后,鉴于“匪势蔓延”,治安大受影响,对他的县长宝座有些不妙,因此他对地下党员的迫害,就更加残酷。1946年4、5月间,曾派自卫中队长陈顺兴率队兵到德化大田边境的十二格围捕地下党员李拌,并由县府特种秘书苏健(苏是国民党德化县党部执行委员)召开乡保民大会,当众宣布李拌是共产党员,将李杀害于洪田保下格坪。与此同时,还抓去当地革命民众曾税(女性,63岁),关在洪田乡长土楼里,严刑迫供,并将曾的两乳头用铁丝吊断。

四

由于德化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地下党革命势力日益壮大。福建省保安纵队司令部奉令于1944年某月,由仙游移驻德化县境,军事工作重新布置一番,藉以达到“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目的。保安纵队司令部系省保安司令部的直属机构,纵队司令由省保安处长黄珍吾兼任,设副司令一名坐镇德化,负责主持日常工

作。副司令许国钧和黄珍吾是同乡，同是“文昌派”健将，许出身于云南讲武堂，是黄珍吾的左右手，他不但仇视共产党，对国民党也有明显的对立。永泰保安团“围剿”地下党武装根据地，出自许的命令，而德化的三青团与国民党县党部的互相攻击，也是出于许的支持，因为许在德化除负责闽中、闽南地区“剿匪”外，还负责发展德(化)永(春)的军统特务组织——三青团，替省三青团干事长黄珍吾扩充地方势力。该纵队司令部组织庞大，军事人员也不少，除正副司令外，设参谋长一人，下设参谋室、副官室、政训室、秘书室及电台、警卫队等部门。

1945年冬，第六行政区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林学渊，副司令钟大均，组织召开六区所辖各县“防共会议”，令各县县长、县军事科长、警察局长前往大田参加会议。会议由副司令钟大均主持，会期两天，主要决定：于大田成立“六县联防办事处”（六县即龙岩、漳平、永安、大田、德化、宁洋），由区保安副司令钟大均坐镇指挥；设立“剿匪”机动部队，士兵由各县自卫队抽调，饷项由各县按月汇发，枪枝子弹均随带，规定，有“匪警”时，不分区域县份机动驰“剿”，集中一部分兵力为后备，机动灵活使用；制定“边境联防会哨办法”、“各县‘匪情’通讯办法”，并限期全面实行“五家连保连坐切结”等反动措施。该“剿匪”机动部队人数不多，可是组织没有几个月就出现粮饷问题，各县政府都以财政困难为辞，不能按期汇寄，队兵给养无着，无形解散。“六县联防办事处”也没有发挥什么有效“防共”作用，成为名存实亡的机构。

“防共”会议后，各县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措施。我在德化赤水乡十八格山上与大田交界处建立碉堡，并搭设临时营房，增派两班自卫队兵驻守，指定军事科科长一人坐镇指挥，日夜放哨，加强巡逻，规定，每日与大田县哨兵（巡逻队）会哨一次，对过路行旅实行检查（指在冬防期间，平时没有检查）；同时，与大田自卫队商定联防办法，即在两县哨兵连哨地点，日间用旗语，夜间用灯号，互相

通报,一旦发现“匪情”,双方部队可以越境“追剿”围捕,杜绝过去此剿彼窜的缺点。在靠近永春县境的某乡,也采取同样措施。因该乡系涂友情的家乡,涂的爱人还在,能双手开枪,地方上尚拥有一部分武力,即责令该乡长苏某负责协防。充实与尤溪交界的葛岭镇与永泰交界的水口乡、与永春交界的锦阳乡的乡镇公所武装装备,但没有布置自卫队。各乡镇公所全部装设电话,加强通讯设备,因在抗战期间,电讯器材,无法添置,便派人到厦门、泉州一带以高价购买偷运进口的军事物资,并编发通话的密电本,交各乡镇长使用。备款向省保安司令部购买子弹若干发,充实县自卫队及各乡镇公所武装力量。当时德化县自卫队兵力非常单薄,加上层层侵吞名额,虚报人数,实际上还没有两个中队的兵力,轻机枪仅有一二挺,队兵经常吃不饱,穿不暖,而且有时几个月没有发饷,战斗力很弱,完全是吓吓老百姓。限期推广“五家连保连坐切结”,指定军事科人员到各乡镇公所督促办理。

1946年春,抗战胜利,国共和平谈判。可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与迫害并没有放松。那时,我刚由德化调到长乐,接到“福长平剿匪指挥部”发出密令,于该指挥部驻在地福清召开“剿匪会议”(兼任“剿匪”指挥官的是省保安第一团团团长胡季宽。胡是湖南人,黄埔军校出身,曾担任省第四行政区保安副司令,和我共过事,当时区保安司令是个光杆司令,底下没有士兵,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我到德化后不久,胡当保安一团团团长,他对待共产党手段比较毒辣)。会议只开一天,除听取各县县长及军事科长报告“匪情”外(当时长乐没有发现什么“匪情”报告),其他内容和六区保安司令部召开的“防共会议”类似。会议议决:抽调各县自卫队兵组织突击队辅助保安团队;定期交换情报。我回到长乐后,只抽调十几名队兵参加突击队,没有采取其他“剿匪”措施。

1946年秋,长乐发现共产党武装部队数十人,由松下过境,所过地方,没有发生骚扰情事。我据报后,曾令该乡长密查踪迹,并